

# 土地改革与闽西苏区社会结构的变化\*

李小平

(厦门大学 马列部, 福建 厦门 361005)

[ 内容提要] 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的土地改革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革命,对闽西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土地改革中,阶级意识的启发与阶级成分的划分,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动员;乡村苏维埃的建立,使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渗透至乡土社会,并由此重构了苏维埃区域的社会结构。

[ 关键词] 闽西;土地改革;社会结构变化

[ 中图分类号] K261.4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2)04-0072-08

费正清在评价中国土地改革时说:“目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社会和政治上的”<sup>①</sup>。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闽西苏区的土地改革即是一场政治、经济革命,深刻影响了闽西农村的历史进程,也是一次社会革命,使苏区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并对苏区农民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产生多重影响。然而,以往对土地改革的研究着力于土地政策及土地制度的演变、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民的政治解放,较少关注土地改革所引致的社会结构变化<sup>②</sup>。本文以闽西苏区土地改革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为例,通过局部研究,作一初步的探讨。

直至近代,我国广大农村一直普遍处于村落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政府权力只伸展至县一级。“村落权力”是指以村落为单位反映的农村体制性权力和村落内生性权力的互动与整合。闽西地区,家族发育比较成熟,“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sup>③</sup>。族居使血缘家族与地缘村庄重合、共生,村落权力不过是家族权利的泛化与延伸。乡绅作为官与民的中介而居于权力结构之中。家族共同体权力(族权)和乡绅权力(绅权)作为内生性权力,与政府权力透过种种

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渠道紧密纠合在一起,共同实施对乡村的统治。近代以来,尽管地方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屡有改变,但在闽西乡村,村落权力一直未受到有力的挑战,家族仍然掌控着乡村社会的基本权力。

土地革命前闽西农村是宗族社会;血缘家庭聚族而居,一村一姓的村庄较为普遍,家庭、房族、家族(宗族)结构上环环相连,家长、房长和族长权力层层相扣,亲属关系纵横交错,各种称谓体现着尊卑亲疏的辈份与等级<sup>④</sup>。在宗族内阶级分化不明显,但贫富差距较大;农民和地主两大基本阶级都是家族共同体的成员,但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地位大相径庭;地主以“地产权利”并借助政权的力量支配和剥夺农民,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精神和物质生活极度困苦。家族作为一实体性组织在村落内具有经济、祭祀、教化、惩治等功能。家族的功能性作用表现为:第一、家族对乡村社会具有整合与保障的功能,是村落权力的化身。经济上一般的大姓家族拥有族产(族田、儒资田、蒸尝田、族墟和族庙),可以举办宗族活动,扶助、周济族众,增强族众的认同感。龙岩适中镇“纵径最多不过20里,但宗族祠堂至少在

\* [ 收稿日期] 2002-06-05

200个以上,其中祭产多者达1000担,少者亦均在10担以上”,宗族拥有的土地占全镇总量的70%<sup>⑤</sup>。宗族土地出租在闽西是普遍现象,宗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政治上具有双重权力,一方面与官府勾结把持乡政,闽西乡村政权操在豪绅家长之中<sup>⑥</sup>,长汀的土豪劣绅掌握“一切政权机关、财政机关”<sup>⑦</sup>;另一方面握有族权,族长握有族产的使用权,以家法族规教化、规范族众的行为,家法族规对族众生活的约束甚于国法律令。同时家族也为其成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以维护家族的利益与声望。文化上通过设立族学(塾)、资助族人求学以考取功名等手段,培养本族精英。土地革命前,上杭白砂中隔保的宗族占有本保60%的土地,田产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支付弟子求学费用,族中弟子读书人占30%<sup>⑧</sup>。家族还利用祭祀祖先、编撰族谱、举办迎神赛会等形式多样的全族性活动,实施对家族成员的教化,强化家族的凝聚力,也使家族成为族众的精神、心理依托。第二、家族的无形影响渗透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民的宗法观念、家族思想浓厚。从岁时习俗、年节娱乐,到迎神祭祖、婚丧礼仪,无不昭示着家族的存在、显示着家族的力量。农民中识字的很少,神权、礼教、家族等观念影响极深,常被土豪利用,酿成家族械斗、族姓残杀的惨剧。永定“姓氏界限甚清,常引起械斗,永结冤仇,因械斗而死亡者甚多,最著名为黄赖械斗及张卢械斗”;武平乡村均聚族而居,多一村一姓,“宗族界限极严,宗法社会的习惯极深”,受宗法观念影响,农民内部纠纷常演变为姓族冲突<sup>⑨</sup>。

土地改革后,在新旧因素的磨合与创新中,闽西苏区出现了以政治系统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农民从家族共同体的依附性成员转化为带有明显阶级印记的社会成员,阶级意识冲击了家族意识,乡村传统的礼俗文化和家族观念被压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政治文化被导入苏区,使苏区农民的行为、信仰和社会心理发生改变;家族组织结构隐没在阶级架构之下,阶级成分成为人们确认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及其相应政治、经济权利的依据,并以此来规限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和深度;族产被没收后,家族承载的社会功能亦大都被各种新型社会组织取代,

如列宁小学取代族塾乡学之教化功能,乡村苏维埃和群众团体代替家族乡党的裁决、协调、保护、济困等功能;村落权力悄然让位于以乡村苏维埃为代表的政府权力,国家权力渗透到农村基层,驱逐了“虚拟”国家职能的乡族势力和乡绅权力。闽西苏区社会结构变化的起点是启发阶级意识、划分阶级成分。

## 一、阶级意识的启蒙与强化

马克思认为农民(以法国小农为例)虽然具有共同的阶级状况的特征,但并“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只有在阶级意识觉悟后,才能起到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sup>⑩</sup>。农民作为一个“自在”的社会利益集团,没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他们会自发地抗拒掠夺和贫困,但“单是贫困事实上不足以引起人们造反……只有当社会统治者的腐败得到充分揭示,这种贫困才变得不可忍受。因此,新的形式和思想应当指出革命的出路。在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过程中,同样是这样一些群众将会证明他们能够容忍二倍和三倍的贫困”。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旧社会的批判者、新社会理想的宣传者、新社会的组织者和创造者的历史责任。“如果没有农民军队和广大村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农民们显然也不可能产生革命的理想”<sup>⑪</sup>。

农民“产生革命的理想”的过程就是阶级意识觉悟过程。首先,红军和党的地方组织用发布告、贴标语、召开群众集会等形式,揭露旧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及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对农民遭受土地奴役和权贵欺凌的痛苦生活深表同情和关切,指出这一切并不是天经地义而是可以改变的,其出路就在于农民的团结与斗争。当农民逐步接受地主收租是阶级剥削、土劣欺压是阶级压迫的观念时,阶级的意识觉醒了,而这种意识本身就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如1929年初《红四军司令部布告》用农民切身感受到的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的事实,使农民意识到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深重,号召农民同共产党一道“打倒军阀”、“合力铲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实现“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

租不要送”、“苛捐杂税,扫除干净”的社会理想。永定县地方党组织发布文告揭露本地土豪劣绅和军阀暴行,呼吁民众挺身斗争<sup>12</sup>。经过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启蒙宣传,原本对政治冷漠的农民渐渐有了政治诉求,“阶级”与“阶级斗争”这一全新的政治概念成为农民认知自己和社会的新坐标。

其次,通过打土豪、斗土劣以显示阶级的力量,树立群众对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的信仰。开始时红军把打土豪没收的谷子、财物等秘密分送到群众家里,慢慢地公开发放,并鼓动农民与红军一块儿去打土豪。当革命的力量站稳脚跟后,便发动群众打土豪,采取先打外乡(村)土豪,再过渡到打本地土豪的策略。打土豪、分浮财令欺压百姓的土劣威风扫地,使饱受欺压的农民感受到“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也使群众在物质上得到实际利益。农民逐渐发动起来,表现出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保守,也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几乎无地可耕或须缴高昂地租的农民更革命”<sup>13</sup>。农民“组织自己阶级的群众,武装暴动,自动地打倒豪绅地主,分谷子,分土地,焚田契,烧借约,成立自己的工会、农会,他们对豪绅地主阶级、国民党的仇恨和欣幸自己的力量,真是到了极点”。闽西暴动中,龙岩白土农民烧田契、分谷子,“数日间杀土豪四五十人”;永定下湖雷群众“自动捕杀土劣”,溪南里农民拆毁象征封建势力的县城城墙;长汀畚心农民“自发集合起来”捉土劣,烧田契、杀猪、派米。上杭县北三区塘下村既无党组织也无农会组织,但农民“自动起来杀豪绅地主,焚烧田契”<sup>14</sup>。应当看到,革命伊始参加暴动的农民不一定都真正理解阶级斗争与宗族冲突的本质不同,有的带有相当强的仇富恨霸的报复心理,而使暴动陷入更深的宗族主义之中<sup>15</sup>。阶级意识的启蒙和“打土豪”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社会动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成功地扩大了政治参与,并利用由此产生的政治力量来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

“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sup>16</sup>。根据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

地位划分阶级,是土地改革的必要前提。划分阶级成分使农民的阶级意识具体化了,并由此达到新的社会整合。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中农所有的土地基本维持不变,缺地或无地的贫、雇农分得土地。分田地使农民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这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取向,“土地重新分配的结果是农民积极并迅速地倒向共产党。……农民更欢迎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sup>17</sup>。然而,近代闽西农村阶级分化不明显,乡族冲突的复杂性、多向性与阶级斗争多样性、多层次性交叠,准确而又合乎实际地划分阶级相当困难。由于富农的资本主义特征发育不完全,带有浓厚封建性(如放高利贷、出租土地收高额地租),闽西苏区常发生把中农当富农、把富农当地主的现象<sup>18</sup>,长汀水口甚至发生枪毙中农、贫农的事件<sup>19</sup>。苏区内出现“三种剥削是富农,五种剥削是地主”的机械分法和“破产地主”、“仁慈地主”、“劳动富农”等名词<sup>20</sup>。

重新分配土地及按阶级成分进行社会资源与社会权益再分配,强化了苏区农民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念。为了保住分得的土地,闽西组织了1万以上精干善战红军、赤卫队,百余万革命群众中有红军、赤卫队的后备军队和少年先锋队有20万以上;为了适应军事与政治斗争的需要,苏区内形成快速、高效的信息传递网,“在苏维埃区域相隔五里就有一个交通站,专门担任代递来往信件。苏维埃下的群众,不论得了好坏的消息马上报告政府。苏维埃区域的消息非常灵通,这种灵敏周密交通网的建设,完全是群众的力量”<sup>21</sup>;“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sup>22</sup>,苏区的社会教育与义务教育皆以“阶级性”、“革命性”和“鼓动性”为宗旨<sup>23</sup>,培养并巩固了广大民众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观念。随着乡村苏维埃的建立,苏区的社会意识日渐阶级化,“各城市和穷乡僻壤的墙壁上布满了革命的标语,就是厕所里都布满了革命的空气”;“各乡建设有俱乐部,它的作用不但供群众游玩,而且是做教育群众最好的地方,它充分表示无产阶级的精神。每晚有人做政治报告,有人讲故事,说笑话,演新剧,唱歌,呼口号”<sup>24</sup>。

苏维埃政府还增设和推行新的节庆纪念日,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二七纪念日等,以强化苏区社会意识的无产阶级化和革命化。

阶级意识的觉悟使农民卷入革命,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农民阶级本身并没有在革命中得到根本的改造:经济上维持着封闭的小农生产方式;政治上崇尚权威尚无民主观念;观念上仍保持着对传统社会的忠诚,小农意识浓厚。毕竟,阶级意识不等于民主思想,阶级斗争亦非民主法制。因此,农民阶级意识的启蒙只是民主化的起点,农村政治现代化进程依然荆棘丛生。

## 二、苏区社会结构的重构

土地改革后苏区社会结构出现新的组合。原有的社会等级划分和社会资源占有被打破,社会财富、社会权力和地位在不同阶级中重新分配,地主与农民的社会地位呈颠覆性改观。土地改革后,闽西农村由阶级分化不明显的乡族社会,转化为农民与地主两大基本阶级阵线分明、相互对垒的社会。苏区内阶级构成为:在总人口中,农民占80%上下,富农约占5%,地主约占3%,其余是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游民。农民各阶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大致为:中农17~20%,贫农65~75%,雇农1~5%<sup>②</sup>。

从社会分层看,苏区内阶级分层取代姓氏之分、家族之别,苏区居民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由其阶级成分决定的。各阶级的权利与义务界限清楚,地位明确。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仅失去土地、财产,经济上被剥夺净尽,而且不给予任何政治权利,政治权威丧失殆尽,社会声望扫地,跌落为最没社会地位、最受鄙弃的“落魄潦倒的居民”<sup>③</sup>。革命伊始,他们杀的杀,跑的跑,大部分被肃清<sup>④</sup>。留在乡村里的大多是中小地主,感觉“从天上被丢到地下来了”,“年复一年衰落下来”。一杨姓老地主分田前生活“相当优裕”,分田后,老婆和他自己非挑担不得饱食。武平外逃地主现钱用罄,生活艰难时,普遍的心理是:“只要共产党不杀,我们都愿意搬回

家去,不要田地也可以”<sup>⑤</sup>。尤其实行“地主不分田”政策后,地主基本断绝与生产、生活资料的联系,被编入劳役队强制劳动,一无所有。一些小地主或上山为匪或逃往白区或讨饭度日。

革命之初,共产党对富农实行的是经济上限制、削弱,政治上吸收、联合的统一战线策略<sup>⑥</sup>。富农大多受过教育,“在社会上早就处于领袖地位”,被大量吸收进党政机关工作,掌握部分领导权<sup>⑦</sup>。富农利用手中权力不失时机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如延迟分田、瞒占良田等),引起党和贫雇农的愤怒与不满;共产国际亦批评中国共产党“联合富农”政策<sup>⑧</sup>。以南阳会议为转折<sup>⑨</sup>,开始执行“向富农进攻”政策:剥夺政治参与权,被驱逐出党和苏维埃组织;经济上受打击,生产条件恶化,经济地位下滑;对富农的定性也由农民之一部分,属中间阶级,转变为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是革命的敌人,富农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骤降。1931年后从经济上消灭富农,他们只能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没收其多余的生产、生活资料<sup>⑩</sup>。次年,征发富农组织劳役队,限制人身自由。查田运动更使富农处境困顿,社会地位跌至谷底。随着对富农阶级定性的改变,富农的社会地位亦经历了大起大落。

农民参与了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也使农民摆脱封建压迫,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农民的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发生根本性改变,成为独立的小私有者。他们主持土地分配、建立苏维埃政权、参加苏维埃选举,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一下子成为乡村政治舞台的主角,“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sup>⑪</sup>。获得土地的农民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生产,粮食产量普遍提高<sup>⑫</sup>,生产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分田前,农民收获的粮食向地主或高利贷者谷仓里集中,自己却无以为生,“卖田、卖屋、卖儿子者比比皆是”,分田后,粮食归自己,一般农民生计改善很多;佃农生活与过去相比也“大有天渊之别”。具有初步阶级意识的农民大量加入共产党,闽西党组织迅速壮大,到1930年7月约有万人之众<sup>⑬</sup>。农民在收缴土豪、民团枪械武装自己的同时<sup>⑭</sup>,踊跃参加红军。在苏区内,农民全面参与苏区的政治、经济生活,成为最有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的阶级。

妇女社会地位提高也是苏区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妇女们走出家门,广泛参与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妇女得到了解放,各级苏维埃代表与委员都有女子参加,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与男子丝毫没有两样,对革命的贡献与男子也是一样”<sup>38</sup>。妇女与男子一样分得田地,到“政府中去做事”,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平等的公民;苏区内实行一夫一妻,废除了买卖婚姻,妇女有婚姻自主权,能够自由地“找爱人”,自由地离婚。童养媳的权益也得到法律保障;妇女们第一次跨进学堂大门,参加夜校、扫盲班、识字班,学文化,取得受教育权;苏区妇女是军事化的妇女,是劳动生产的重要力量,“她们截了发,赤着足,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妇女”<sup>39</sup>。

从社会关系上看,苏区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外部残酷的军事围剿环境,使人们把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简约为黑白两极、敌我对立的阶级斗争关系,社会关系急速唯阶级化,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唯成份论等致命性错误。苏区社会关系呈泛政治化、唯阶级化倾向,使苏区内不仅按阶级地位分享社会资源,而且各种社会组织的建立亦以阶级为畛域。查田运动中将已经参加革命数年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不问表现如何一概清除出政权机构,送劳改队,怕他们逃跑还在他们头上开“马路”<sup>40</sup>;地主、富农不准参加劳动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群众组织,只能被归入劳役队、苦力队。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阻断正常的社会流动,使社会结构缺少发展变化的弹性,显示出僵化封闭的特征,不利于苏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社会结构特征上看,苏区社会结构具有封闭性和先赋性特征。封闭性是指苏区内各阶级既各自封闭又与其他阶级相互隔离,即阶级构成的非开放性。地主就是地主,贫农就是贫农,阶级成分一旦划定,个人无论如何表现,都无法改变自己的阶级归属。先赋性是指苏区各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不是凭自己的业绩获得,而是由他所属的阶级决定,即确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是阶级。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居民社会地位大变动是引入“阶级”标准后,人为划分出来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是

被动的,阶级成分一旦划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就固定下来,不由他去流动。每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是预设好了的,社会成员只要他被类属于某一阶级,他就先赋地拥有了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不可僭越阶级分隔。如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应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只有农民才享有政治权利,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所以将地主富农出身党员、干部清除出党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的政策与行动,可以说是对地主、富农僭越阶级界限的回击。因此,苏区居民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动,与其说是社会流动还不如说是阶级定位<sup>41</sup>。

在苏区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民仍以小生产方式进行低水平简单再生产,社会经济结构没有本质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农民的思想观念和整个苏区的社会结构无法突破传统的特质。

### 三、苏区基层权力苏维埃化

土地革命打破地主阶级对乡村权力的垄断,铲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使国家权力渗透到偏僻的乡村基层,实现了社会权力转移。其中最具意义的是农村苏维埃取代村落权力。

闽西苏区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乡苏维埃,它是全乡选民“选举出来的全乡政权机关,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是一个具有广泛权力的基层国家政权,乡村中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sup>42</sup>。由群众选举产生的程序使乡苏维埃具有行政合法性;议行合一的代表会议制则从制度上保证农民群众“话事”主事的权力。苏维埃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居民有固定的联系,使苏维埃政权得以与民众直接沟通;群众对代表的工作进行直接监督,无法胜任工作或选民不满意的代表或被罢免或是将在下一次选举中落选。上杭县才溪乡1933年10月进行乡苏选举时,先公布候选人名单,让群众评议。下才溪每村贴一张160多人的候选人名单,群众在候选人的名下填写意见,受到群众批评的有20多人。8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选举,老人也撑着棍子到会。下才溪前任代表73人,落选的有23人,50名连任,新当选代表41人。上才溪53名前

任代表中有 32 人落选, 21 人连任, 新当选代表 54 人<sup>⑬</sup>。代表会议下设有常设或临时委员会, 才溪乡就设有拥护红军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劳动合作委员会等。委员会由乡苏代表和普通的农民共同组成, 围绕苏维埃政府的日常工作和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乡苏领导下的委员会制度让农民直接参与行政管理, 既扩大了政权的参与面, 也培养了农民的自我管理、相互协调的能力。因此, 毛泽东在考察了才溪的情况后说, 委员会制度“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 “使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乡苏维埃的建立, 使乡村权力从地主士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里, 乡村政权的基础由地主士绅变为农民群众。

苏维埃政府拥有广泛的社会职能<sup>⑭</sup>, 其影响力渗透到苏区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闽西苏维埃政府不仅颁布了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等法律, 而且发布通告禁止杀耕牛、禁止烟赌、保护婴孩以及关于组织残废院、设立赈灾委员会和募捐等法令, 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以规范, 乡苏依法律、法规行使职权, 牢牢地掌握了农村基层权力。

解决了农村一切斗争。修理了一切水道, 农民间一切扯皮不清的事, 苏维埃政府都干脆解决了。现在农村里除有声音宏亮的歌声外, 没有打架啼哭的声音了。

各乡都有由群众集股开设的消费合作社, 减轻了他们所受的剥削, 还组织了各种生产合作社, 共同经营, 共享权力。

各县开设列宁师范, 区乡列宁小学已在十分之六七的地方开设了, 成人补习夜学亦渐渐处兴办, 还有一种普遍的识字运动。现在闽西男女老幼, 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多数区政府办了信用合作社, 群众可向政府贷款, 打破了高利贷的剥削。

苏维埃决定了劳动保护法, 废除了一切虐待工人的条例, 得了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

苏维埃区域没有叫花子, 没有偷窃, 政府把他分配了工作, 参加了革命战线。一切残废无依靠的人, 政府给了大笔经费供

养。

区乡政府聘请了医生, 设立公共看病处, 苏维埃下的群众有病去诊断, 不取分文钱, 同时设立药材合作社。现在农民不但发生政治问题要提出意见到苏维埃解决, 就是身上小小的病患, 都有苏维埃解决; 同时区乡苏维埃也就不但可以解决工农的政治经济问题, 连工农身上的病患, 苏维埃都有解决的本事。<sup>⑮</sup>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农村站住脚, 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在苏区建立起稳固的基层政权, 基层政权组织强化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其所建立政府的权威, 又抓住了大部分农民群众, 从而增强了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力量。“红军与苏维埃区之所以发展存在, 在第一个重要原因为中共的土地政策……苏维埃政府成立, 实行没收土地、重新分配。满足农民毕生所愿, 对红军自大为感戴, 惟恐其败”<sup>⑯</sup>。苏维埃权力渗透至农村基层,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国家权力延伸到村落, 村落权力置于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 受到打击并退缩到政府权威的背后。反观国民政府各种乡村改造的顿挫, 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国民政府对农村渗透受阻, 造成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同乡村的疏离, 国民政府治下, 在乡间担任公职的人有两派, “一派是不做事体的好好先生, 一派是武断乡曲的土豪劣绅”<sup>⑰</sup>。因而它在农村实施的各种土地政策都因缺乏社会基础而难以推行, 无论是土地整理、田赋整顿、租佃改良还是扶植自耕农均以败而终。

苏维埃政权建立与逐步稳固的过程中, 却呈现出政权组织的阶级构成越来越单一化、纯净化的特点。如初创时期的苏维埃吸收一些富农出身的人, 有的还居于领导地位<sup>⑱</sup>, 是苏维埃政权重要参与者。1930 年后, 肃清富农路线的斗争日益高涨, 加紧反富农斗争, “坚决的在政治上排除富农出政权机关, 经济上限制富农的经济发展”, “红军中排除富农流氓分子”; 在苏维埃中“坚决的洗刷富农”。于是, 基层党组织和苏维埃中只剩下贫农、雇农和极少数知识分子, 虽然突出了农民在乡村政权中的主导地位, 但大大缩小了乡村政权的政治资源。农村苏维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纯正的农民政权。

苏区政权机构的唯阶级化、唯成份论,对闽西苏区土地改革的良性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中央红军北上后,闽西苏维埃政权主导下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被打断了。返乡地主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向农民反攻,欲强行恢复地主阶级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但是遭到农民的抵抗,经过土地革命的暴风骤雨,闽西社会已经无法恢复到原有的轨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交织,彼此争夺,成为20世纪30~40年代闽西社会的一大特点。

首先,地主与农民阶级较量的态势总体来说发生逆转,地主处于攻势,农民处于守势,但是,在局部地区双方依力量对比强弱而显现出不同状态:在龙岩、永定、上杭等农民势力较强的分田区域内,地主回乡后无法恢复权势,农民仍对土地形成事实上的占有,向政府交纳田赋,承担土地所载有的各项义务,拒绝向地主交纳地租;即便是在一些地主恢复了业权的地方,农民对地主的地租负担也一定程度地有所减轻,地主对土地的控制权受到一定的牵制与削弱。农民和地主矛盾尖锐的上杭白砂几酿成地主村庄与农民村庄为争夺土地的集体械斗。因此,恢复地权运动效果并不好。国民政府治下土地制度的调整(龙岩扶植自耕农运动、上杭白砂土地国有实验等),就是基于土地制度已经无法恢复到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样一个事实,不得不进行的一次土地制度改良。土地改革区的高利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借钱的高利贷减少乃至消失,借谷的高利贷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利息较非土地改革区为轻。

其次,经过土地革命,农民对国家、政府和自身的认识有所改变。据章振乾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调查,土地改革区的群众对社会生活的态度与非土地改革区的群众有所不同,如在龙岩土地改革区农民分得土地后努力耕种,无出卖劳动力之事,而非土地改革区则经常有农民赶墟排队待雇;土地改革区的农民交纳田赋达99%,踊跃完粮已成为一种风尚,而非改革区地主占有土地,大半欠缴田赋,收取田粮极为不易,白沙捷步就是显例;土地改革区农业推广工作较为容易,而非改革区却“毫无办法”。上杭“分田地区的人民对政府帮忙很大,表现在运

输、修路、接济粮食各方面”。<sup>⑨</sup>

闽西苏区社会结构的变化,尽管是短暂且是局部的,但对整个闽西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农民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在游击队的支援下,坚持不懈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保卫已取得的土地改革成果。据统计,闽西苏区之龙岩县、上杭县和永定县约15万人口地区的农民群众,通过保田斗争,基本上保持了土地改革后形成的分田状态,这在全国堪称奇迹。

注释:

- ①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271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 ② 有关前者的研究成果专著有: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孔永松著《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孔永松等著《闽西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成汉昌著《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一些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亦有涉及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如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1997》,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陈益寿著《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乔宗寿、王琪著《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李占才著《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后者专著仅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④ 孔永松、李小平:《客家宗族社会》,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 ⑤ 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16~17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1996年。
- ⑥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180页。1981年。
- ⑦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4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 ⑧ 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151页。
- ⑨ 《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491页;第1辑,190页;第2辑,300页。1983年。
-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下),693~69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



- ⑪[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710页脚注;2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 ⑫《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9页;100页。
- ⑬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65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
- ⑭《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72页;第3辑,65页。
- ⑮《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178页。
- 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66页。
- ⑰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210页。
- ⑱孔永松:《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86~88页。
- ⑲中共龙岩地委党史研究室:《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299~300页。鹭江出版社,1992年。
- ⑳《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229页。
- ㉑《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0页、81页。1982年。
- ㉒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80~8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 ㉓谢济堂:《闽西苏区教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 ㉔《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1页。
- ㉕《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142页;第3辑,275页。
- ㉖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21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 ㉗《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296~301页。参见第3辑,380页。
- ㉘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26~28页、172页。
- ㉙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270~27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 ㉚《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206页;第4辑,60页,325页。
- ㉛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282页。
- ㉜《富农问题》从总体上改变对富农的估计,认为富农“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富农“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行为”已成农村斗争中最严重的问题。要把富农当作地主一样看待,无条件开除出党,剥夺其选举权,不得参加苏维埃;没收已分给富农的土地,按抽肥补瘦重新分配;废除富农的一切债权,从分青、平谷、筹款和征税等方面打击富农。《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329~338页)。
- ㉝《土地法草案》,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282~285页。
- ㉞《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22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 ㉟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92~9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 ㊱《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394~395页。1929年5月党员约1300人。《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48~49页。
- ㊲《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296~301页。
- ㊳《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0页。
- ㊴《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72页。
- ㊵上海纺织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印:《温仰春同志关于闽西革命斗争史若干问题的回忆》,第11页。1990年编印。
- ㊶何友良认为苏区存在“广泛的社会流动”并“以垂直流动为主”。见《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第3章第1节。
- ㊷《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1931年11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146~176页。《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1930年3月),《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195~197页。
- ㊸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337~338页。
- ㊹蒋伯英、郭若平:《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13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 ㊺《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80页。
- ㊻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59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 ㊼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45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 ㊽《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321~322页。
- ㊾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4页,6页,7页,55页,98页。